

# 论国家赔偿的精神性人格权请求权

孟晓娟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4

**【摘要】**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不以人身为载体却与人格密不可分权利,其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一面。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本文笔者从余祥林案入手,分析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性,并以图寻求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完善。

**【关键词】**国家赔偿法 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权包括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两种,前者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人身为其载体,它体现的是人的自然性的一面。精神性人格权则包括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不以人身为载体却与人格密不可分权利,其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一面。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害公民物质性人格权的情形,《国家赔偿法》是明确承认其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而就精神性人格权而言,尽管其余国家的关系往往体现为,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可以成为侵害精神性人格权的免责事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行为就不可能侵害公民的精神性人格权;如某地公安机关将参与卖淫嫖娼者加以游街示众,在笔者看来,就侵害了这些人的名誉权。此时是否存在国家赔偿问题?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对此并未作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处于对国家的特别保护,认为国家侵害精神性人格权因其不在《国家赔偿法》明确列举的类型之内从而不属于该法的保护范围,此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笔者最近认真研读了关于余祥林案的方方面面,发现其中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余祥林系湖北京山人,身为当地治安员,平日公务繁忙,其配偶因受刺激以及精神压力巨大而于某日出走。在家人寻找未果之时,堰矿中有女尸浮现,办案人员未经任何鉴定就将余祥林定位犯罪嫌疑人。百般的刑讯逼供,使余祥林最终“坦白”。而该案件虽然屡次因证据不足而被发回重审,但最终余祥林还是被判终身监禁。十一年的铁窗生涯,十一年后“亡妻”竟破天荒再生,余祥林也被宣布自由。从国家赔偿申请人余祥林一方角度看,余祥林蒙冤入狱,屈打成招,妻离子散,家破身亡,牵连无辜,身心俱碎,其造成的各种有形和无形损失,岂是仅按照羁押天数计算的20多万元就能赔偿的了!仅仅赔偿有形的物质损失,不赔偿看似无形、压抑在善良无辜出具“良心证明”的邻县乡亲身上的沉重精神枷锁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是既不合人情,又不合法理的。

笔者认为,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侵害,同样应有国家赔偿责任的适用,其赔偿范围包括:<sup>①</sup>财产损害。如果因此而导致财产损害的,自然应该赔偿财产损害,如受害者因此而导致被开除的,国家应赔偿其工资收入。<sup>②</sup>非财产损害(精神痛苦)。对精神性人格权侵害必然会导致受害人产生精神痛苦,通过金钱赔偿的方式来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sup>③</sup>人格权请求权。精神性人格权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仅仅通过金钱赔偿的方式对受害人来说是不够的,因此还有必要通过赋予权利人以特定的人格权请求权,请求侵权人通过一定的形式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对于在实在法上被称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期准备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已有规定。《国家赔偿法》把赔礼道歉作为赔偿的一种方式,有其独特新颖之处。从各国立法来看,将赔礼道歉作为国家赔偿的方式几乎无此先例。立法过程中,曾产生过争议,有人主要认为国家机关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无异于“隔靴搔痒”,起不到对公民被损害的权利的救济作用。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国家机关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对受害人的精神是一种安慰,有利于化解矛盾,达成谅解,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管理职能。赔礼道歉作为国家赔偿方式中的一种补充方式,其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国家赔偿法》中对于用什么形式进行赔礼道歉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民法通则》规定的赔礼道歉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有人认为,可以由行政机关方面口头向受害人表示歉意但为保证赔礼道歉的严肃性,应将口头道歉的内容记录在案。如果适用书面道歉的方式更为合适,或者受害人更乐于接受书面道歉的形式,则由赔偿机关将道歉内容以书面的形式送交受害人。笔者认为,鉴于国家赔偿的特殊性,赔礼道歉原则上应当采取书面方式,同时可以口头、新闻或电视公告的方式予以补充。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应在什么范围、用什么方式进行,《国家赔偿法》没有具体规定,

难以操作;如果赔偿义务机关不给受害人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也没有法律手段可以采取。而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现行《国家赔偿法》则并未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不规定精神赔偿的做法,是不合理、不公正、甚至是不人道的。因为在收到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国家名义作出的违法行为侵害时,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不仅仅表现在肉体上,同时表现在精神上。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他有头脑、意识和精神。任何外力在作用于其肉体的同时,通过其神经、视觉、听觉,同事甚至预先作用于其精神,使其处于严重的恐惧、焦虑、羞辱、悲愤状态以致精神失常者,屡屡可见。致人死亡后给其家属、子女造成的精神痛苦,更是沉重深远。因此,当侵权行为纠正以后,仅给受害人物质损害赔偿,不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做法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不人道的。而且,对受害者的这种侵害,不是来自普通公民,不是来自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的违法犯罪分子,而是来自代表人民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来自以道德和法律的神圣名义给予的非法压力。这种压力对当事人的精神摧残远非其他痛苦可比。

对于此种精神损害,多数国家均以金钱方式予以补救,此种方法亦逐步扩大适用到国家赔偿领域之中。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现行法均明确规定,国家赔偿除依本法规定外,适用民法规定。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也规定:“美国联邦政府,依据本法关于侵权行为求偿之规定,应于同等方式和限度内,与私人同样承担民事责任,但其责任不及于判决前之利息或惩罚性赔偿金。”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61年11月24日对勒都斯兰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尽管缺乏实际上的物质损害,儿子的死亡给父亲造成的痛苦,也可以作为对后者赔偿的充分理由。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还曾以“对于生存条件造成紊乱”为由,确定给某死者的父母高于死亡事故应赔偿金额的补助金。

对精神损害承担财产责任的实质,是借助物质手段达到精神慰藉之目的。如同以物质奖励的形式达到精神鼓励和社会表彰的目的。规定对精神损害的法律救济,是社会对人格价值尊重和保护的表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成熟的表现,是人类重视自己的精神财富的表现。诚然,精神财富、人格利益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但物质利益对于精神的慰藉作用又是客观的。我国《国家赔偿法》是一部既从中国实际出发又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较好的法律。一方面,11年司法实践表明,它在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寸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另一方面,11年的司法实践也暴露出我国《国家赔偿法》立法的不少缺陷。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要求修改和完善《国家赔偿法》的呼声很高,有的还相当激烈。赔偿标准过低、缺乏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即是其中之一。此一问题如不及时妥善解决,必将影响《国家赔偿法》的进一步贯彻实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有待完善。《国家赔偿法》实施时间不长,案件不多,立法和司法经验不足,许多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和展现。在此种情况下,《国家赔偿法》不可不改,也不可大改。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可以增加规定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造成伤害或死亡时,非刑事司法侵权行为造成公民名誉权、荣誉权损失时,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名誉权受到非法侵犯时,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则除上述规定外,还应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受害人在国家赔偿请求中没有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后,不得以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